引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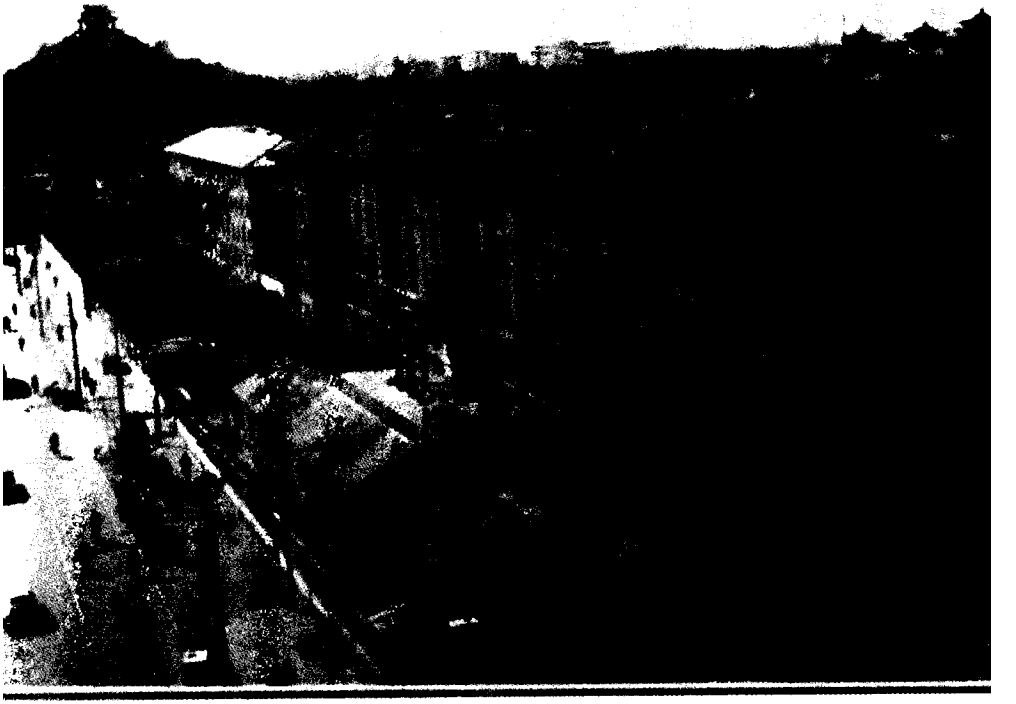
陆定一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革命家，新中国的元勋之一。

陆定一出生于家道殷实的书香门第。父亲陆澄宙是律师，后又担任民国的法官。陆定一弱冠之年就在上海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电机系毕业。他没有遵从父亲之命到美国留学，也没有去谋求待遇丰厚的电机工程师的职务，而是献身革命事业。1925年他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团的‘五大”,他当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不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从此，直到1996年去世,71年的革命生涯中,有50年是在中共高层担任领导职务。他曾经创造出



◎1925年，陆定一毕业于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北京大学红楼，五四运动发祥地

辉煌的成就，也曾遭遇坎坷，受尽人间的屈辱。他的一生，是忠于革命、忠于人民、忠于党的一生，也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共青团的秘密工作

1925 年 6 月，陆定一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指派，担任了共青团上海法南区委书记。

法南区包括法租界和华界的南市，范围相当大。中共党也有一个法南区委员会，区委书记就是陆定一的入党介绍人张永和。当时党和团的经费都很少，不能给他们开工资，每月只发给为数很少的生活津贴。津贴扣除伙食、交通费以外，所剩无几。他们租不起好一点的房子，就在法租界望志路望志里 2 号租了一间亭子间，两个人蜗居在这个斗室里干革命。

团法南区委专职干部只有陆定一一个人，工作主要是和几个建立共青团组织的学校、工厂联系，参加他们的会议和帮助他们开展工作。

陆定一在团法南区委工作的时间很短，只有两三个月，1926 年九十月间，他即被调到团中央。这是因为当时少共国际派来一个驻中国共青团的代表叫纳索莫夫，团中央需要有人和他联络。纳索莫夫懂得英语，而陆定一可以用流畅的英语和他对话，因此把他调去了。纳索莫夫夫妇两人一起来中国，他们的身份都是极为秘密的，到上海后，纳索莫夫改名为卡拉钦斯基，自称是“白俄”，他的夫人叫卡拉钦斯卡娅。租界当局对于外国人并不去寻根究底，因此谁也不知道他们的秘密使命。陆定一假装向卡拉钦斯卡娅学俄文，每星期到



◎1927 年任弼时(后中)与陈琮英(前右一)等合影

他们寓所去一次，谈谈共青团的工作，听取他的意见。纳索莫夫的作风还不错，他从不向中国的团中央随便发号施令。但他在中国没有做多少工作。这段时间里，陆定一倒是弄假成真，学了一点俄文。

在团中央，陆定一除了做这项联络工作以外，也在宣传部协助起草文件，编写宣传提纲，没有具体职务，只能算是个打杂的。团中央的总书记是任弼时，领导人还有恽代英、萧楚女、萧子璋(萧三)、李求实等，以及几个做具体工作的同志。

为了工作上方便，陆定一搬出望志路望志里那个亭子间，到四川路底的庆云路庆云里和任弼时住在一起。这是一座弄堂房子，任弼时、陈宗瑛夫妇住在楼上，陆定一住在楼下。陆定一刚搬进来，任弼时就对他说："咱们总得有个关系才好呀，不然查户口怎么说呢？你就叫我舅舅吧！"陈宗瑛也要陆定一叫他"小姑子"。其实任弼时只比陆定一大两岁，因为他显得老气，倒也有点像舅舅的样子。"小姑子"是湖南的称谓，究竟是什么意思，陆定一始终弄不清楚。他们都是刚刚认识的，但是革命的情谊使他们亲密无间，像一家人一样。

不久团中央又要陆定一协助编辑《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

年》是团中央的机关刊物，1923 年 10 月 20 日在上海创刊。它的宗旨是“为革命的青年作革命的指导”，具体地说，就是指导青年参加革命运动；系统地向青年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并指导他们进行研究；系统地帮助青年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世界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和一般社会问题；批判各种反动思潮；报道青年的活动；评介各种书刊。原来的编辑是恽代英，他担任这一职务时间比较长，做出了出色的成绩，是共产党内一位出色的理论家、宣传家。陆定一到团中央工作时，恽代英已调到党中央了，这时主编由团中央宣传部长李求实兼任。但他担任这个职务的时间不长，就被调走了，由刘昌群继任主编。

经常在《中国青年》写文章的，除了恽代英外，还有任弼时、萧楚女、萧子璋等。刘仁静、郑超麟也写过好几篇。陆定一曾对笔者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他说，萧楚女是个才华横溢的宣传家，他年轻时在武汉饭馆里当堂倌，没有上过正规学校，靠自己刻苦学习掌握了丰富的知识，能写一手好文章，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显微镜下的醒狮派》，对国家主义派的揭露真是淋漓尽致，在当时很有影响。他的文章很受读者欢迎，名字又特别，以致有人误会他是个女的，曾写信来向他求爱，并约定见面地点。他真的按时去约会，对方一看，原来是个满脸麻子的黑大汉，很不好意思地走了。这件事当时被传为笑谈。萧楚女这位青年领袖，著名的宣传家，1927 年 4 月，被国民党沉溺于珠江，英勇牺牲。

陆定一参加《中国青年》的编辑工作后不久，即搬到四川北路横滨桥附近的横滨路和刘昌群住在一起。他们两人住一间房间，这里既是《中国青年》的编辑部，也是他们的卧室。这时纳索莫夫已经回国，陆定一用不着每星期去和他联系了。团中央严格要求他们保守机密，非有重要事情不能外出。他们只好日夜困守在室内，除了编改和撰写稿件外，就是看书，有时实在耐不住，只好在房间里吊嗓子，唱京戏，来调节生活。

陆定一参加编《中国青年》杂志，开始时是翻译一些文章，比如从上海的英文报纸《大陆报》上翻译黄浦江中停泊了多少外国军舰之类的短文，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有一次，他在英文报纸《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勒氏评论报》上看到转载美国《亚细亚》杂志的一篇《广州成为亚细亚洲激进中心之底蕴》的通讯,是美国作家 L. S. Gnnett 写的,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广州蓬勃开展的工人运动。文章说，在中国，只有广东是真正民治的省份。孙中山是人民的恩人。广州的运动或者失败，或者将成为燎原烈火,燃遍全国。陆定一感到,当时广州受到北洋军阀、反动派的大肆攻击，思想保守和不明真相的人也对它疑虑重重。说广州好话的人,就被一些人看成是‘过激党”“赤化的宣传”。美国人说的话，可以起到我们所起不到的作用。因此他把这篇文章翻译出来，题目改为《美国人之广州观》在《中国青年》上连载了两期。

这个时期的《中国青年》，很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知识的介绍，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此外，《中国青年》也注意从各方面关心青年，如向青年介绍进步书刊，答复青年提出的问题，批评在青年中流行的不健康的思想，等等。

在团中央工作时期，陆定一曾到上海大学学习。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办的，名义上校长是于右任，但他从不到学校来,校务由教务长邓中夏主持,瞿秋白、任弼时、恽代英、沈雁冰、陈望道等曾在该校任教，后来实际上已成为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陆定一参加学习的那个班，类似党校的性质，学习的内容是党的纲领、组织原则、国共合作方针、秘密工作的纪律,等等。每个星期天上一次课。负责讲课是党的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组织部长赵世炎等。他们在讲课中既讲了理论、原则问题，又联系实际讲了他们的斗争经验，很受大家的欢迎。上海大学是因陋就简办在弄堂里的，把弄堂房子中间的墙壁拆掉，就成了教室。陆定一这个班上课时还站岗放哨，警卫人员看到是学员，才放进教室。上课时黑板上随便写些与讲课内容毫无关系的文学课的大纲，这是防备万一反动军警来搜查时应付他们的。在上海大学的学习中，陆定一系统地学习到一些党的知识，那些秘密工作的知识对他来说尤为可贵。直到上海三次武装暴动，这个班才停止上课。

1926 年 10 月到 12 月，北伐军先后攻克武汉和南昌，有一支先头部队已到达浙江，战争即将推进到上海，国民革命的形势发展很

快。但是，反革命的逆流也越来越明显。 1927 年 3月,蒋介石残杀江西总工会副委员长陈赞贤。接着，九江、安庆等地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仍一味妥协，事事姑息迁就，对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则处处限制。面临这样的形势，不能不引起陆定一深思，为什么蒋介石如此气焰嚣张，我们党又显得这样软弱无力？当时他还没有认识到党中央领导人犯了错误，只觉得这样下去，不仅工作难以展开，而且对革命同志也已构成严重的威胁，问题将如何解决呢？

那时瞿秋白在党中央负责宣传工作，陆定一在团中央做宣传工作，他们经常见面。正当陆定一迷惑不解的时候，有一次瞿秋白对他说“:同志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有分歧,党内有斗争。’瞿秋白的话对涉世未深的陆定一震动很大。“党内斗争”，这是他第一次听到的。在秘密工作中，同志们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干革命的，目标一致，亲密无间，为什么党内会有斗争呢？陆定一一直琢磨着瞿秋白这句话的含义，回顾几个月来的情况，他终于明白了，开始懂得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也深为局势担忧。

这年 3月，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共青团虽然没有参加起义，但都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起义很快胜利了，并且成立上海市民政府。这件事情对陆定一是极大的鼓舞。他热情洋溢地写了《破天荒的上海市民政府》,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文章讴歌人民建立的自己的政府。他说：“破天荒的上海市民政府，为中国革命开了个先声。虽然我们不敢断定这次政权究竟能否稳定，或将为帝国主义与反动势力所摧毁，但我们相信，至少这次市民政府在国民革命中有重大意义。它将教育革命的民众取得政权，并教育他们如何取法。不久，我们知道，我们将看到民主政权之新时代。这种斗争,将更保证革命之胜利,更促进反革命之崩溃。”

可是白崇禧的军队随即进入上海，窃取了胜利的果实。胜利的形势昙花一现。只过了不到一个星期，蒋介石就撕下革命的假面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四一二以后，蒋介石制造白色恐怖，到处逮捕共产党人和工会干

部，几乎天天都有人被捕被杀。陆定一住在租界里，共青团又没有暴露，处境稍微好些，但也受到很大的威胁。有的同志曾经提出必须进行武装斗争，不能赤手空拳让敌人来逮捕；也有人提出拉一支队伍到茅山去。可是上海没有这个条件，也没有懂得乡村游击战的人，只好作罢。

这时党中央在上海已经很难立足，武汉的国民政府仍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党中央、团中央都决定迁到武汉，陆定一也奉命转移到武汉。

党的“五大”和团的“四大”

1927 年 4 月 20 日左右，陆定一和在党中央做宣传工作的郑超麟结伴，由上海乘轮船去武汉。

当时，长江沿岸很不平静，中国招商局的轮船随时都可能被军队拦截，把旅客轰上岸。军队是不敢去外国轮船拉兵差的，检查也没有那么严格。陆定一他们乘的是英商怡和公司的轮船。这些外国轮船公司乘机大敲竹杠，一张统舱票竟卖到 45 块银元，顶上普通职员两三个月的薪水。轮船在南京、安庆靠岸时，蒋介石的军队都没有上来检查。九江是朱培德的地盘，四一二以后，朱培德没有立即对共产党员下毒手，直到 6 月 6 日才“欢送”（驱逐）共产党员出境，因此轮船停泊九江时没有受刁难。一过九江，许多乘客都活跃起来，开始高谈阔论。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他们的政治水平都超乎寻常，有人对时局简直是了如指掌。原来乘客中有许多革命者，李立三、罗亦农、王荷波都乘这艘轮船，共产国际代表伍廷康（魏金斯基）和王明也在这条船上。大家终于平安无事到达武汉。

陆定一到达武汉没几天，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作为共青团选出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

五大是在大革命的紧急时刻召开的，当时国共两党的关系已经

极为复杂、微妙，但是统一战线还是维持着，两党联席会议也继续在开，从表面上也还看不到情况的严重。

4月27日，五大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小礼堂举行开幕式,出席的有代表80名，还有列席的和来宾等共100多名。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易和魏金斯基也出席了会议。当时以左派面目出现的谭延闿、徐谦、孙科也应邀参加。大会开始后，先由陈独秀致开幕词，汪精卫代表国民党来致贺词。随后陈独秀做了长篇的政治报告，基本上是“汪陈联合声明”的调子，既没有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也没有明确提出今后的方针政策，而且一再为他的错误辩解。会议举行开幕式以后，就暂时休会，过了五一节，改在汉口黄陂会馆继续举行。

这次会议反映了陈独秀没有认识他的错误，并将继续推行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会上分发了瞿秋白写的一本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扉页上印着“是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史中之孟什维克主义”，这本小册子非常引人注目。瞿秋白从理论到实践系统地批判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主要是批判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

瞿秋白还批评右倾机会主义不愿做军事工作，反对武装工农的错误；认为无产阶级应当取得革命军队的领导权，重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发展农民武装和工人武装。

陈独秀主持会议，他不让代表讨论瞿秋白的意见。后来瞿秋白也在大会上发言，他还是维护陈独秀的领袖地位的，没有点他的名。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在会上做了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的报告。会议做出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

陆定一参加了党的五大，进一步认识了瞿秋白说的“党内有斗争”的含义和事实。这次大会反映了党内对许多重大问题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这些问题不解决，必然要影响革命的前途。

这次大会仍然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多年以后陆定一谈起这件事情时说：

看来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瞿秋白等同志批评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是在全体代表中，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严重危害性还认识不足；二是陈独秀是党的缔造者之一，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建党时期的同志除李大钊外，其他的不是他的学生，就是他的后辈，大家仍然敬重他，希望他能改正错误，继续担当党的领袖这个重任；三是当时党内还没有出现更孚众望的人物，只好由他继续担任领导。总的来说，对陈独秀是迁就的，积极追随陈独秀的彭述之，则在五大以后就离开党中央了。现在回顾五大，瞿秋白带头同陈独秀、彭述之斗争，这是立下功绩的，瞿秋白的意见也不能说全部是正确的，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是有帮助的，但共产国际的意见也有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地方，瞿秋白则迷信共产国际，以为中国共产党还不能自立，只能一切听命于共产国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

党的五大于 5 月 9 日闭幕，紧接着，5 月 10 日共青团也在武汉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午大会开始后，首先由共青团湖南区代表团提议推举任弼时等 9 人为主席团，随后总主席任弼时致开幕词。他说，这次代表大会是在革命形势最紧张的时候举行的，我们的责任至为重大，简略地说，就是这三个方面：一、集中全国青年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武装干涉，反对世界未来的战争；二、依据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指导，为打倒背叛革命的资产阶级，创造非资本主义的革命前途而奋斗；三、代表青年工农及一般被压迫青年的利益，继续为改良青年生活而斗争。



◎在白色恐怖下化装掩护工作的任弼时

大会进行了选举，任弼时连任团中央总书记，杨善南任组织部长，刘昌群任宣传部长，陆定一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刘昌群担任这个职务的时间很短，

就调动了工作，由陆定一接任团中央宣传部长。

大革命失败

这个时期的武汉，充满着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曾经严厉谴责蒋介石，甚至开除他的党籍，并声称要进行“东征”予以讨伐，实际上武汉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薄弱，它只有唐生智的第七军和张发奎的第四军支撑着，而且这两个军的主力都在河南北伐前线。所谓“东征”，只有干打雷不下雨、虚张声势而已。

唐生智和张发奎虽然都同蒋介石有矛盾，是支持武汉政府的，但他们也反对工农运动。唐生智曾通电反共，辱骂湖南的共产党人为“暴徒”。北伐军中很多军官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他们也说要革命，其实并不懂什么是革命，不少人为追求升官发财，才投入北伐军队伍的。陆定一谈过武汉出现过这样的现象：那时正是夏天，在汉口长江边的马路上，每到傍晚就有一些年轻军官，夹着公文皮包，穿着皮鞋，裹着皮绑腿，手里拿着一根皮鞭，携着一个妖艳的女人，神气活现地在人群中走来走去，显示他们高人一等。人们称他们的这种装束是“五皮主义”。从这一个侧面可以看到国民革命军中一些军官的精神境界。各地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开展后，直接威胁北伐军军官的家庭和个人的利益，他们就站在反动立场对三大政策不满，对共产党怀恨在心。5 月 17 日，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率部向武汉进攻。这种行动是地主资产阶级以及反动军人反对共产党的反应。这时武汉防务空虚，十分危险，幸而叶挺临危受命，带兵在武昌郊外把夏斗寅的部队击溃，才使武汉转危为安。

夏斗寅叛变后的第 4 天，湖南又发生了“马日事变”，许克祥在长沙大肆残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许克祥叛变后，武汉政府听任甚至支持他去镇压革命群众，这就反映了 4 月上旬已从上海到武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汪精卫、唐生智等人对共产党的态度了。

在共产党内部，五大前后争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比如关于领导权问题，陈独秀坚持他的“二次革命”论，始终认为国民革命要由资产阶级——国民党来领导。关于农民运动问题，党内不少同志赞扬湖南的农民运动。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革命》（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曾在沈雁冰主编的国民党中央的报纸《民国日报》上发表，许多同志认为是好文章。陈独秀及其追随者则叫喊农民的行动过火，实际上是取消农民运动。工人运动方面，瞿秋白、任弼时等都主张发展工人武装，也遭到陈独秀的反对。

在工农运动中，确实也有过头的地方，如武汉周围受到反革命军队的包围，工厂所需原料运不进来，产品销不出去，资本家面临着经济困难的局面，工人却在工会的领导下，在改善生活待遇方面向资方提出过高的要求。某些青少年的行动也过火了，如有的童子团在江岸一带看到穿长衫的，就用剪刀从背后把它剪掉。陆定一等一些做团的工作的同志是反对这种做法的，但又觉得不便干涉，真是左右为难。

与此同时，反对派对共产党则是步步进逼。5月间，共产国际为了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曾经给它驻中国代表罗易送来一份秘密指示，提出中国共产党应当武装五万工农，二万党员，以应付局面。这份秘密指示罗易没有交给中共中央，却给了汪精卫，这无疑是向敌人告密。6月5日，汪精卫攻击共产国际的指示是“破坏国民党的阴谋”，并解除国民政府中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职务。6月2日，朱培德在江西叛变。6月10日，汪精卫、唐生智、孙科、谭延闿到郑州和冯玉祥举行会议，决定武汉政府北伐军全部由河南回师武汉，镇压工农运动。6月19日，冯玉祥到徐州会见蒋介石，决定了反共、反苏、宁汉合作等反共决议。会后冯玉祥致电汪精卫、谭延闿“速决大计”，促使“宁汉合作”。汪精卫等自然接受了，武汉政府也就和蒋介石一样，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

在局势发展到极为严重的时刻，中共中央在6月30日召开了扩大会议。在陈独秀主持下，强行通过了一个“关于国共关系的十一

条决议”，这个决议竟提出：“中国国民党既然是反帝国主义工农及小资产阶级所联盟的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这不仅不能挽救时局的危机，反而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中共中央许多同志反对这个决议，任弼时提出要起草一份关于土地革命的“宣言”，也说到武装斗争问题，准备经中央批准后以共青团的名义公布。这份“宣言”后来称为《政治意见书》，是由任弼时和陆定一等团中央的领导人起草的。 7 月 1 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东湖一个庙里召开了“东湖会议”。参加这个会的有中共中央委员和各方面负责干部几十人，任弼时和陆定一代表团中央参加。会议一开始，陈独秀就滔滔不绝大谈和国民党联合的重要性,指责工人、农民走得太远,现在必须对国民党退让。

恽代英、瞿秋白接着发了言，他们都不同意陈独秀的投降论调，主张开展工人运动和土地革命，发展革命势力。起先，陈独秀还克制着自己，当任弼时拿着他和团中央的同志起草的《政治意见书》要发言时,陈独秀便暴跳起来,夺下任弼时的稿子,当众把它撕得粉碎,扔在地下用脚踩了几下。20 世纪 80 年代初陆定一谈到他目睹的这些情况时说：“陈独秀的家长作风发展到这个地步，党内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正确意见还有可能被接纳吗？这是陈独秀的悲剧，也是我们党的悲剧。对陈独秀的这个行动当时就有许多同志表示不满，这次会议终于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就散会了。这件事情过去 50 多年了，至今我的印象还很深刻。党的领袖领导着全党的工作，关系重大，如果他具有民主作风，犯了错误还比较容易纠正；如果独断专横，听不得不同意见，错误就可能越来越严重。由于陈独秀一意孤行，终于使我们党遭到极为严重的挫折，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会后不久，陈独秀掼纱帽不干了。7 月上旬，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对付这种局势,同时组成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 5 人的常委会。

7 月 15 日,汪精卫终于彻底撕下‘革命’的假面具,和蒋介石一样叛变了革命，挥舞屠刀，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杀来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也就宣告破裂了。

低潮中的斗争

参加八七会议

国共合作破裂以后，武汉这个大革命后期的政治中心，血雨腥风，已经没有一点革命气息。许多共产党人迷惘、困惑，不知道今后应当如何。

周恩来领导南昌暴动的消息传到武汉，给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极大的鼓舞，留在武汉的同志，真是翘首等待着中央的具体指示。

8月6日，任弼时通知陆定一第二天去参加中央的一个重要会议。开什么会，讨论什么问题，任弼时都没有详细说明。陆定一想，既然是中央的重要会议，一定会对当前的局势做出重大决策，今后的斗争方向就明确了。这一夜，陆定一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入寐，巴不得快一点天亮去参加会议。

8月7日早晨，陆定一按照通知来到汉口三教街41号（现在鄱阳街139号）。这里是共产党的一个秘密机关，住着苏联农业顾问洛卓莫夫夫妇。陆定一看了后面没有人跟踪，才到二楼敲门，来开门的是洛卓莫娃，她是这个机关的管理人员，一些同志戏谑地称她的谐音“老祖母”，其实她才30来岁，她认识陆定一，很快放他进去了。会场很小，大概只有20多平方米，室内只有一张三抽屉桌子和几把椅子、凳子。会场里已有不少人，有当天到的，也有两天前由“交通”

带进来的。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如果被敌人发现，来这里的人很可能被一网打尽，因此会议也做了应付万一的准备，倘若反动军警闯进来，大家就说是在开股东会议。

出席的代表共 21 人，其中：

中央委员 10 人：罗迈（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

中央候补委员 3 人：李震瀛、陆沉、毛泽东；

中央监察委员 2 人：杨匏安、王荷波；

共青团中央委员 3 人：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

湖南代表 1 人：彭公达；

湖北代表 1 人：郑超麟；

中央军委代表 1 人：王一飞；

邓小平是中央秘书，他负责筹备并参加了这次会议。此外，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

1980 年，陆定一对笔者谈了会议的情况并作了简要的评论：

会议由李维汉主持，他简明讲了中央的一些情况，如成立了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五人组成的常委会，鲍罗廷已经回国，共产国际派罗明纳兹来担任驻中国的代表。鲍罗廷主要是同国民党联系的，除了五大以外，在我们党的会议上，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李维汉还说，共产国际来了训令，指出中共党内有机会主义，应召开紧急会议来清算这个错误，并改组中央等等。他也说明这次会议是由瞿秋白、张太雷、李维汉和罗明纳兹一起筹备的，原定 7 月 28 日召开，因为通知开会困难和来不及准备报告，才延期到 8 月 7 日。直到当天，到会的中央委员还不到半数，地方党组织只有湖北、湖南有代表参加，因此会议不能称为中央全会，而是紧急会议。他宣布会议的议程是三项：一、共产国际代表报告；二、常委代表报告，报告人为瞿秋白；三、改组中央政治局。

接着，罗明纳兹做了长篇报告，瞿秋白担任翻译。罗明纳兹只有 30 岁左右，侃侃而谈，颇善于辞令。因为要经过翻译，他的报告占去很长时间，几乎是一个上午。



◎八七会议会址。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政权是要由枪杆子去取得的”重要思想

中午，洛卓莫娃为大家准备了午餐，吃的是面包和午餐肉罐头，一个罐头有好几斤重。吃完午饭只休息半小时左右，又继续开会了。

下午首先讨论罗明纳兹的报告，然后瞿秋白代表常委会做报告。接着讨论《告全党党员书》、《工人运动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和《组织问题决议案》等文件。这些文件都没有成文，只由主持人讲一讲大意和读一读稿子，即交代表表决。这次会议制订了这些文件，指出了斗争的方向，可以说是很丰硕的成果了，当然还要看是否能真正实施。因此讨论常委报告和文件时，没有发生意见分歧，很快就通过了，然后由常委去做文字修改。

会议最后是选举临时政治局成员。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 9 人是 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罗迈、任弼时、彭湃 候补委员 7 人是 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有的书上写，八七会议撤销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

这不是事实。会议没有做出撤销陈独秀职务的决定，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时，也很少点陈独秀的名，因为他还是共产党员，大家仍希望他能改正错误，继续在党内工作。

八七会议只开了一天，散会时天还没有黑。为了安全，每隔半小时才出去一人。陆定一是离开得较早的，出了门太阳还没有下山，有的同志则是第二天或第三天离开的。

谈到八七会议是怎样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怎样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作为党的总方针时，陆定一说：八七会议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罗明纳兹的报告中，一开始就指出陈独秀犯了不要农民、只要资产阶级、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说，陈独秀违反共产国际的指示，为了拉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让步，使我们党失去独立性，以致现在国民党赶跑我们,杀戮我们。陈独秀的理论和实际行动是‘少数派’(即‘孟什维克的’)‘不革命的’和‘社会民主党的’。

毛泽东同志在发言中用很生动的事例批判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他把国民党比作等着人家去住的新房子，而党的领导人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其后像新娘子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那所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没有当房子主人的决心。群众中也有不听中央命令，抓住国民党下级党部，当了房子的主人翁的，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广大党内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领导机关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

这是陆定一第二次见到毛泽东，第一次是在党的五大会议上，他对毛泽东的印象不深。这次毛泽东发表的一通宏论，给陆定一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陆定一接着说：

八七会议是对右倾机会主义一次猛烈的开火，宣告陈独秀路线的结束，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是八七会议的第一个功绩。

八七会议上，罗明纳兹强调：“目前中国已进到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可以引导中国到另一个新阶段。”瞿秋白在代表常委会的报告中也指出：当前“土地革命已进入到最高点”，要通过组织农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